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中国

2004年3月12日

叙述者：王行娟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主任

访谈者：张健 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

地点：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办公室

录音转写：王平 陈琛

张健(以下简称张): 非常感谢王行娟老师您参与我们这个国际课题,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 您在这个妇女非营利组织这种发展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多年了, 是十六年。是吧? 您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主要想了解一下您怎么走上这条道路, 为妇女, 为广大的妇女解忧排难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工作当中来的?

王行娟(以下简称王): 很好的, 我也是觉得, 嗯, 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啊。那个, 我们那个“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是在1988年10月成立的, 到现在已经第十六个年头了。开始它的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那么, 在1996年呢, 和中管院(中国社会科学管理研究院)脱钩以后, 我们就改名为“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那么, 这个组织呢, 已经是, 就是说, 这个...经历了那么长, 这样一个历程。它是在我, 这个...退休...1988年在北京出版社离休以后那么带头创办的。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女性和我一起来弄的。

很多人现在都问, 就是说为什么在88年的时候, 你会关注到这样一个, 就是说妇女的问题。因为在这以前, 我一直从事的是文化和新闻这样一个工作, 在

报纸呀，在出版社呀，这样工作。并没有在妇女的圈子里头，为什么会关注到这样一些，这个...而且带头搞这个，搞起这样一个民间的妇女组织。我觉得我记得自己最早的时候是一种...出自一种，就是说对女性的，就是说她的现状的关怀，和一种忧虑吧，是这样一种出发点来关注到妇女的。

我想你们可能都清楚，啊，80年代以后我们中国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那么，改革开放真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希望。是吧，对妇女来说呢，有喜也有忧。因为妇女在这样一种，就是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变革的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面，一些妇女的地位上升了，是吧，她们成为了从过去一个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家女，她成为了企业家，领导者，是吧，这个厂长、经理，甚至是，人家说这不仅是白领，而是金领了。但是这只是一少部分的，多数的妇女，她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她是要重新找到她自己的位置。很多妇女，这个...她就感觉到，就是说她失去了她原有的一些经济地位，而且失去了她原有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失去了她家庭中的一些地位。随着经济制度的一种，从那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那么，很多工厂都在剥离那个妇女的人员。

我记得最清楚了，88年，正是我要退休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就是《中国妇女杂志》从一月份第一期开始到年末，它搞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叫作“1988，妇女的出路”。这里头登的文章就是谈到，就是在优化劳动组合当中，妇女被剥离了。剥离了以后，妇女的出路何在？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篇文章就写一个女工，她被剥离下来了，回家了。开始她还特别高兴，觉得唉呀，我终于可以不要早起贪黑的去干活，可以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这个...可以很好的伺候丈夫，照顾孩子。没想到回去以后，就是说，怎样照顾，丈夫的脸色都不好看，总觉得你吃我的，你干嘛了？你在家就干这点活还干不

好。家里婆婆也歧视她，婆婆瞧不起她，就是说别人的，那个...怎么不下岗，就你下岗了，肯定你在单位不好好工作。女儿也瞧不起她，觉得妈妈下岗了，自己不光彩。那么，这个女人...这个妇女，她就写到她自己，她说，我几次在河边徘徊，走来走去，觉得没有出路了，我几次想跳下去，了却自己的一生。那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这样一个个案，这个...它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很多妇女感觉到，一个是没有出路，不知道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妇女的地位却下降了。妇女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当时我正是在那个全国妇联那个婚姻家庭研究会，我是...就是说被她们聘请去主编一个杂志，叫《婚姻与家庭》。那时候就有很多的那个妇女就来访问我，她们就很明确的提出来为什么社会的发展要以一代妇女的牺牲作为代价，这是一个问题对我触动很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妇女的参政。这个，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是《中国妇女杂志》的这个讨论。而1988年呢，中国妇女报也开展了很大一个的讨论，关于妇女参政的问题。那时候呢，正是中国正在改变那个选举制度，由过去的定额变成差额选举。就是说，原来是比如说选9个人，他就给你9个名字，大家画圈就行了。那么，现在呢，他就给你...9个人，给你11个名字，就是说可以"差"掉两个。这个，这么一"差"下来，就是所有的妇女，就是说"差"的都是妇女。所以，那时候，就是很多省、市，四套领导班子当中，一个妇女干部都没有，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张：您说的四套领导班子，哪四套？

王：四套，一个是全国人大；一个是全国政协；一个是国务院政府，人民政府；还有一个是共产党。市委、省委、中央，四套领导班子里头有很多省市连一个妇女都没有。我们北京郊区还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选举村里头的

那个妇联干部，结果还选了一个男的。就是说，妇女的参政，就大面积的这个...下降。所以那时候就是，妇联就是开...《中国妇女报》就是开展了讨论，就是说妇女参政的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本人啊，是一个知识女性，是吧？在，呃，就是说解放前我就是个大学生，在金陵大学这个中文系读书。那么，49年的时候呢，这时不是革命的形势发展特别快嘛，需要大批的那种干部，就是说文职干部嘛。所以，就从学校里头，那时候，我已经是，地下的时候就已经入团了嘛，所以，就作为干部就调出来到了新华日报去当记者。因为它...就是“四野”（第四野战军）嘛，它就是，南京解放以后还要往南推进，往西南嘛。所以就能留下的政工干部是很少的，所以那时候大批的那个...我们那时候金陵大学那群学生就参加了工作。所以我是最后一批离休干部了，是这样子参加了工作。

那么，在我这个，嗯...在我那么一生的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呢，应该说，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受到的歧视不是来自于性别，而是来自于这个出身。就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地主...一个父亲开过一个小买卖，这样的，这样一种出身的话，在提拔，在用人的方面是受到影响。但是因为我自己一直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原来在新华日报，后来到了中国青年报嘛。那么，最后呢，文革以后呢，去了北京出版社。那么，我自己认为我不比任何人差。所以，我的自信心还是很强的。我觉得这主要是一种极左的一种思潮，对那种出身，认为出身不好。其实我的父亲很快就平反了，就不是什么地主了，而是一个农民，中农，因为他就那么十来亩地。是吧，但是这个包袱一直就背着，就是这样一种...

那么，所以我觉得我没有社会性别意识，我过去对那个妇联我也瞧不起它，觉得都是那些小脚老太太无事生非在那儿唠唠叨叨的。我根本看不上这些，

我都觉得我都不把它划到了，就说这样一个范围内的。那么，文革以后，我这个开始从关注少女，我就从那个关注少女，青春期的少女，开始关注妇女。然后呢...因为我自己青春期的时候，过的非常困难，有两次我自己都想自杀的。就是因为 我出身在一个大家庭里头，姐妹很多，那么，家庭经济也不好。像我那个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这样一个中间长大的那么个女孩子根本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关注，一下子就这么大的。所以，在青春期的时候，就觉得对社会非常悲观的一种看法，就是这样一种。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也锻炼了一种我自立，自强的这样一种心理啊。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艰难。当时我就想长大了如果有人给我一点温暖，给我一点关怀，我觉得我不会过得那么艰苦。

所以，这一些善良的这样一种对妇女自己，这样一种...一直是埋藏很深的。一直到，就是说文革以后，那么，妇女的这种...我听到了亲耳听到妇女的这种哭诉，看到妇女...感觉的就是说她们的那个失落，(没有)失去的地位，那种在家庭中受到...我觉得我震撼，对我很大的震撼。我就觉得...所以我从 80 年代就开始就研究妇女。那时候我还在编一些女性的丛书啊，什么，现代女性的丛书，那是最早的第一批，那是跟陶春芳一块合作的嘛。编的那个十来本，那都是很畅销的，第一套现代女性的丛书，就关注妇女的命运。那么，在我离休，88 年 10 月，我是 88 年 2 月从岗位上退下，那一年我是 58 岁。

张：您是什么岗位？当时是什么岗位？

王：啊，就是北京出版社的编辑。

张：编辑。

王：编辑。对，我在北京出版社编过很多书。哲学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

有那个，就是青年读物什么的。所以我就重新研究了少女，我写过好几本关于少女的心理呀，少女的...少男少女的心理指导啊，这样的，然后呢，我就进入到...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86 年开始和全国妇联那个婚姻家庭研究会聘我当那个，就是说一个副主编。就是等于来主编这个《婚姻与家庭》杂志。就是说从研究少女到研究婚姻家庭，到，进入到研究妇女。我觉得我自己是这么一个历程。一步一步的这么走过来的。从这么样。

那么，我自己觉得...我就看到了 88 年两大事件，就刚才我说的。一个就是说，优化劳动组合，妇女失去了她的岗位，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在家庭中也受到了歧视。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参政。这样这些。那么，我就觉得我有一个心愿，就觉得...我想就是，既然我要退下来了，我就有了时间，而且我有了兴趣，是吧，而且我认为我也有这个能力为妇女做一点事情。那么，那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就是听党的话，把我放在那里，我就在那里做好我的工作。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了。我应该自己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那么，当然我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因为我搞了那么多年的文字嘛。我也就是写报告文学呀，这些都是我的所长。我本来也就学的中文嘛。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妇女做一点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在她们妇女最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伸出一个手来，对她们可能会...让她们更好的度过这个...这样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候，那对妇女来说，也是一个...一种阵痛。社会出现了这样一个，她面临的更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我觉得没有人研究。当时就只有中国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没有一个妇女研究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应该研究，为什么社会发展了要以牺牲一代的妇女为代价。这个要有人去研究这个，但是没有人研究。这个...我就有点不自量力，反正我觉得我

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在这之前，我已经写过好几篇关于参政，妇女的出路啊这样一些文章。所以呢，就想集合一批有志者，来...能不能办一个民办的妇女研究所，研究这些问题呢。那时候全国妇联的妇女研究所是1990年才成立的。我是88年10月，比它提早了一年多。

张：你这个组织啊，注册啊，成立啊，顺利吗？

王：还可以，因为我们当时挂在一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下面，这个组织呢，它也是个民办组织。但是它呢，是挂在国务院的那个体改委吧。

王：这样子是一个...也是一个作为有了一个正式的，国家的，中央单位的挂靠的。这样，那么，人家对...说要成立一个妇女研究所，也觉得挺好哇。它也不需要给我提供任何资金，资助。那个开办费都是我们自己掏的。

张：个人掏的？

王：个人掏的。那时候两万块钱嘛，我们开办费。我自己就掏了一万。陶春芳啊，还有我的朋友啊，她们也...就说几个开始创办人嘛，也都掏了一万。就这样我们就自己就干起来了。那时候，很多...那时候我把妇女界的很多朋友都请去了。那个像刘伯红啊，冯媛啊，什么侯志明啊，还有那个...很多人吧。那时候都请到我家，我就说我想创办这样一个组织。谢丽华也是在内。我就说我想创办一个民间的妇女组织。她们都很支持，这样...全国妇联也支持。那时候是张帼英当第一把手嘛。张帼英就派了那个关涛，那时候主管妇女研究，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还到那个...我们的那个会议上祝贺。就是说表示支持吧。还作为...把我们还作为团体会员，(笑)全国妇联的团体会员，还是...还是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就是说还只是精神上的。那个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第一个课题研究的就是，中国社会妇女就业的趋势的研究。就在国务院，

在十三个省市搞那个试点。就是说下岗...就是那个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的工厂，我们到那儿去搞那个问卷调查。写出了第一份报告，那就看...那时候就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下岗，就是说这个剥离的话，是以...就是首当其冲的是女工。女工即使是再就业，她的职业结构是下沉的。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可能要有个阶段的就业，或者是这个半职制，就是说一个工作，两个人来做。上午一个人，下午一个人，提出来很多的一些建议。这是我们第一个搞的课题。就是因为我受到那个...就是说“1988，妇女的出路”，就关注到这些女工的那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课题就是妇女参政。我们当时搞了很多局级，处级以上，搞了两千多份问卷的调查。这些钱都是自己找来的。就是要研究妇女参政。就是说她这个在一个领导的岗位上，女性的心理，她的困难。而且呀，正因为了解了这个，我们就办了很多期，办了大概有八期，九期全国女领导干部的培训。全国女领导干部的培训最早就从我们开始。我们和《中国妇女杂志》联合，用她们的名义，实际上工作都是我们做的。

张：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哪些？

王：主要的内容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比如管理学呀，这些以外，我们就已经用社会性别的观念，就是要，就是为什么女领导干部参政那么困难。我们分析了，就是说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女性在领导岗位上，她们往往只是副职、只是摆设。那么，女领导干部，女领导干部应该用什么样一种...就是说心态来面对这样的工作。当时的女...很多妇女根本不愿意参政，主要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在调查的基础上，和《中国妇女报》搞了第一届妇女参政的研讨会。而且还出了一本书《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这些都是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有一个...我们当时主要是搞研究的开始的，研究妇

女，因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没有人关注。但是我们研究了以后出了书，登在了杂志上变成了铅字，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实际上是想影响决策，但是我们的声音真是太微弱了，不是说能够...这种声音，我们这种呼吁能够直接上达上去的。而且有一个外国朋友就问我了，她说：“王老师，你认为你做到现在，你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去搞调查、研究，你认为有用吗？会不会真的对妇女的发展有用？”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问话问的非常好，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的研究应该和社会科学院那些研究应该是不同的。他们的研究就是说认为应该和现实拉开一段距离，这样才能够具有科学性。而我们研究的是热点问题，妇女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变成铅字就完了，我们希望能够让妇女了解到为什么她们现在是这样一个处境，那么，她们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处境。对吧，她怎么样才能跟上这个社会的...你不可能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还陶醉在过去那个计划经济吃大锅饭铁饭碗的这种状态。不可能。但是妇女的心理，她的状态还停留在这种我是公家人，公家要管我一辈子这种心态。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这种竞争的这种上岗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更多的要影响妇女，让她们能够把我们研究的这些东西变为她们的想法，改变她们的观念。

那么，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觉得怎么做呢，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物质资源是非常欠缺的。是吧，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人力资源。有一批像我一样热心妇女事业的人士，她们愿意为这个...为这些姐妹，能够分担她们的忧愁，给她们提供帮助的。所以，我就想，我说可能开个热线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因为只要有一个房间，有一部电话，我培训一批的志愿人员，我就可以开了。它...就是说它的资本的投入是最小的，但是它的产出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只要你这个热线开通了，那个妇女只要花

一点电话费，拨通这个电话，她就可以把她心里的烦恼，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告诉她为什么现在的妇女会面临那么多的困境，出现那么多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是吧，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

所以，正是 1992 年吧，我正在美国，一个朋友帮助我，一个美国朋友，她说有一个基金会很小，它就是帮助你们，像你这样一些小的民间组织。当时我们连个帐号都没有，她说它不要帐号都可以给你们资助。她就，她问我你想申请什么，我说我想申请开通一个热线。好了，申请了一万美金，而且还是第一年第一次只能给五千美金。我就开了一个私人的帐号，它就把五千美金给我汇过来。用这五千美金我就开通了妇女热线。

张：1992 年？

王：1992 年 10 月...9 月，1992 年 9 月。当时有些人就说，这个妇女热线热不起来，中国妇女没有打电话的习惯。但是开通以后妇女热线特别热。这是中国的第一条专门为妇女开通的热线。这个非常热，所以...

张：那当时在中国开通热线很容易吗？不需要什么手续？

王：不需要。

张：刚才您提到...妇女热线，我记得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王：嗯，是。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那个，真的，所有的，差不多所有的传媒都那个，呃，都报导了。新华社发了通告，中央电视台的联播，中央电台的联播上，什么全都登了。各个，那个什么...地方的报纸都发了这个消息。所以呢，电话呀，就不断，所以...

张：而且是面向全国的吗？

王：是，向全国的。有些电话还从日本，从瑞典，从斯德哥尔摩打过来。

张：是华人？

王：华人。对，她们面临的一些困难，她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一听说有这个妇女热线，就往这个热线上打这个电话了。所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我们自己也感到特别高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就是说为妇女服务的这样一个阵地。实际上就说...有的人觉得你只是很少的人能打通这个电话，所以，后来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扩大。我们又开通了专家热线，又开了第二条妇女热线，后来又开了老年妇女热线。接着又搞了一个语音...法律，语音服务热线。就是把所有有关妇女的权益的这个都录到那个电话里，让那个电话 24 小时，除了我们开通这几个小时以外，它自己都能够自动在那里接听，通过语音告诉大家很多妇女的权益。那包括今年 3 月 8 号我们又开通了反家暴的热线，所以，就实际上就是说，从这里看到了，就是说很多心有困惑的妇女，她们是需要得到帮助的。那么这个帮助呢，可能她们觉得，就是说，因为，一个是它是保密的，另外它是最简便的。我们也不问姓名，不问地址，也不问单位。只要你打了这个电话，你说了这种情况，那么她会得到我们咨询员对她们的理解、关怀，而且帮助她做一些分析，传达一些信息。这样对于她...缓解她的心理压力，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都是有好处的。

张：那您这样的帮助这些求助的妇女，您的理念是什么呢？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帮助她呢？

王：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还对女性主义的那个理论什么这些书，我还没有怎么看，实际上完全出自一种很朴素的，就是说对女性的关怀。这就一个女人应该自立，应该自己站起来。是这样开始的。我不是从接

受了女性主义的理论，然后开始，而是从我这个...关注着我们妇女的地位。我们觉得就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她自己应有的这样一种权利。关注到她们的状况，想改善她们，让她们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获得平等的权利。只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后来嘛，就是参加了一些，特别是邱老师，邱仁宗，他连续每年都搞两次女性主义的讨论，那个研讨会。我不知道你参加过没有。那么，这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蒙。很多种，比如说伦理，女性主义的伦理是什么的，女性主义的哲学是什么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是什么的。一个方面，一个方面，每年那时候他都搞两次，连着搞两次的这种。但是对我的帮助也不是很...就是说这只是...就是说接触到这样一些...

张：是什么时候呢？

王：他是92年就开始，就四年，大概，他就每年...福特都资助他。邱仁宗先生他是那个...社科院哲学所的，专门搞伦理的。他研究的就是那个女性主义的伦理。他分门别类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妇女的生殖健康的权利，女性的家庭暴力，在家庭当中的权利，他分了很多个领域，每年都有这样，这些都...我每次都参加的。那么，我开始接触了这样一些。那么，对这些理论我还是很感兴趣的。

我觉得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嗯，我觉得是95年，大概是，可能是95年。还是94年？还是95年？就是那个我去印度，参加了一次女性主义的关于家庭暴力的这样一个研讨会。这一次会，真的，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指导我们妇女热线，我就对我自己触动很大。在那个会上，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觉得印象...印度，像那个泰国啊，这些国家，它的妇女的地位比我们中国要更低了。可是他们那些女性主义为了，就是说...维持...不是...争取到她们妇女的权益，她们做了大量大量的工作，她有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楚，她说不能随便把一个受虐的妇女交给心理学家。（笑）她就说不能随便的，因为这些心理学家没有女性意识。那时候它不叫社会性别，就叫女性意识。因为他们没有女性意识，他们会把她就作为，就是说中性的，作为人文主义的关怀这样来对待。实际上这种对待是对妇女造成的第二次伤害，是责备了受害者。所以...而我呢，正好是我是开心理咨询热线，我认为我们是在帮助妇女，对吧，我们在帮助妇女。但是说，我们没想到，就是说我们会...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社会性别的观念，女性的意识，我们这个帮助实际上是对她们的伤害。哎呀，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回来以后，那么，我又读了一些书。而且我们有一次研讨会，特别的有意思。我们就有一个妇女，就拿了一个...我们一个咨询员，拿了一个个案，拿出来讨论。她就说，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离婚的妇女打来的。这个妇女呢，是这个就是说她结婚不久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就发现丈夫有外遇。这种情况底下呢，她想流产，丈夫不肯，丈夫就说你要流掉的话，我们马上就离婚。她总觉得我这个刚刚走进婚姻，我这个婚姻如果离掉的话，也是，就觉得心里头还没有这样一种准备。那么，她就想是不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可以挽救这个婚姻吗？她就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下来以后，实际上并没有能够挽救这个婚姻，最后还是破裂了。离婚的时候呢，因为孩子才一岁，一岁多，很小。就判给了她。都是...在法院就把这个孩子，男孩儿，就判给了那个...而她那时候就有病，就是有了肾炎，就是得肾病。她就...而且呢，她的工资很低，她觉得她无力抚养，那她就申请，就希望那个男方来抚养，但是这法院就判给了她，认为那么小的孩子离不开妈妈。那么，她就只好承担。这个判了她以后呢，那个丈夫经常不给抚养费，而且呢，就越来越身体越不好，还经常住院，还下岗了。5年她带着这个孩子，那孩子6岁的

时候，她去法院申请，就是说变更抚养关系。这个法院不肯给她立案，不接受。为什么，就是说，你还像个妈妈，你做妈的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就是说没有...就是说不肯给她立案。那么，她在这种情况底下，她打电话到热线来，就是问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我不能够这个...就是说变更这种扶养关系。你说法院这样做对不对？就这么一个个案。我们的咨询员怎么回答，跟那个法官完全一样。就是说你既然生了他，你就应该抚养他。你既然生了他，你应该履行你母亲的职责，你再天大的困难你也应该克服，因为你是母亲。

她们说...在我们那个业务研讨会讨论这个个案时，很多人说，你这个咨询员咨询有缺点的话，只是她共情的不够，就是说态度不够好，但是她的立场是正确的。在这个就展开了争论。那么，为什么一个母亲就有责任，做母亲的就有责任来抚养，那么做父亲的为什么没有责任呢？为什么那个父亲不能够来抚养这个孩子呢？变更了抚养关系，为什么就不像母亲了呢？做母亲的就无论她怎么样，她自己的这么个条件底下，这个她就应该受到责备吗？为什么父亲不受到责备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说一个有没有性别意识，在这个个案当中，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这种观点。我们就这么，我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开了窍了。

所以我们后来通过这个个案的讨论，我就把那个，那个冯源、葛友俐，还有那个杜洁她们请来。给我们的咨询员进行社会性别的培训。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妇女热线的志愿者没有社会性别意识，那么这个妇女热线也没必要开。因为她必须是要站在妇女的立场上，要为妇女着想。我们不能够还是对妇女，对这些妇女进行责备。用一种错误的观点来让她们更找不到她们的自我。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断的用这个社会性别的观念来培训我们。我们开始培训几期那个志愿者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用社会性别，没有这课。现在我们第一课就是志愿精神，第二

课就是社会性别，这是绝对不能少的。别的课都可以减少，但是这两堂课我们认为必须做的。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社会性别的观念在我们心理咨询当中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个案的讨论就，就看到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很多人她认为是我们搞心理咨询是以人为本的，是以人为中心。这个以人为中心就已经包括了妇女，我们没有必要再强调以妇女为本。那么我们就要跟她们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以人为中心当中应该包括以妇女为本，包括妇女为中心。妇女处在边缘的状态，中性的以人为本，这种往往掩盖了这个以男权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现实。就不能够给她...反而就是说伤害了妇女。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所有的培训，我们的...在这一段当中实际上是有争论的。我们有一些督导，就反对这个用那个社会性别的观念来指导我们这种咨询。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原则绝对不能够那个什么（改变）。

所以这些课，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开那个反家暴热线，我们就要重新培训咨询员。我们就说谁要上这个线，你们要申请，我们要重新培训。培训用什么，就用社会性别观念，就用以妇女为本的观念来进行培训。这一种培训以后，那么她们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二次伤害，什么话是不能问的。比如说他为什么打你？这个话过去她们可能就会问。但是我们说为什么打你就叫做有原因，只要有原因你就可以打。实际上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什么原因，他都不能打。对吧？因为打人就是违法，就是对他人权的侵害。比如说唠叨，回家晚，做饭做的不合口，这些都是属于夫妻之间的沟通，夫妻之间关系的调试的问题，而不属于违法的问题，不属于人权的问题。而打人就是违法，严重的是犯罪。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不能因为她唠叨，她激怒了你，你就可以打。像这些都是在学习了社

会性别观念之后，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咨询员，现在也，越来越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热线的开通，我觉得它不仅是，就是说我们把这样一些观念灌输给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也用这样的观念来，就是说帮助那些来话者。

我就说这种自立、自强，妇女自己靠着自己的腰杆就能挺起来，给她这种自信心。这一种应该成为一条红线贯穿在我们妇女热线所有的咨询当中。这就是我们这样做，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热线的开通，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帮助了一个。我们从 92 年开通到现在，到去年年底，我们接了七万五千个电话每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个案。到今年 3 月，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进八万个电话了。每一个，每天我们要接三十个电话，是吧，一个月要接就是好几百个电话。六百个电话左右。

张：您这每天的这个电话开通多少个小时？

王：十八个小时。

张：十八个小时。几条热线？

王：三条热线。

张：同时开通。

王：对。晚上三条线同时开通。你们一会儿可以去拍一个，我们热线开通那个，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

张：据我所知，像您的这个组织啊，就“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那么，这个组织呢，不仅仅开通了热线，你同时还做了其它的很多项目。

王：对，对。

张：在天津，我记得您还给警官，给警察，法院，法官，医生，这些都做过性别培训。您能谈谈为什么要给他们做培训？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视角

的这样一些内容的培训，而且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王：实际上天津那个项目叫作“家庭问题社区干预”。为什么叫这样一个问题呢？这实际上也就是妇女热线，刚才我说的，不仅是我们服务于妇女的这样一个阵地，同时是我们了解妇女，倾听妇女的呼声的一个窗口。我们把那个研究妇女和服务于妇女是结合起来的。我们因为正是很多妇女的电话，她们就说，哎呀，这个我...我的抚养权，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我争不到了。我这个受到家庭暴力了，我找了组织了，组织不管。我去找了110，110不管，我去找了派出所，派出所说这是家务事也不管。她说我投诉无门。我们为什么一批的妇女这么烦恼呢？她们的权益为什么得不到维护呢？我们对这些个案，我们研究了四百个案。全都是妇女遇到了问题，家庭方面的问题，离婚的问题、财产的问题、继承权的问题，这些问题，她们都寻找过社会的帮助，但是她们得不到支持。我们把这四百个案拿来进行了...花了两年的时间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们分析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它是从一个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的转变，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单位很多的职能改变。它过去对一个职工的生老病死它全管，对不对？现在不管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他根本不管你这些东西。单位的现在的国营单位他也不愿意管这些事。那么，社区呢？这个事情应该是由社区来管。可是社区呢，根本没有认识到，它的职能的改变，就是说它应该把这一部分的责任担当起来。所以，成了...就是说一个真空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所以说社区干预，就是社区需要把那个干预的系统建立起来。那么，怎样才能建立起这个...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们那个研究搞起来一定要用新的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这个社会性别的理念。这样一种新的理念，因为这个，这引起了传统观念动摇，它就是说动摇社会的这个...改变他们的观念。

张：改变可以主导社会的人士的观念。比如医生这种权威，法官，警察。

王：它主要是把社会性别进入到社会主流，社区的主流。我们是做了这样的工作。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我们就发现，主要就是说，他们这种，就是说这个，呃，不重视那个妇女的权益，还是因为一种传统的观念。“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是吧，“男主外，女主内”是吧，男人应该成为一家之主，女人应该顺从。是吧，“三从四德”这种传统的观念，这样在，那就左右着他们的观念，所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吧？谁都不愿意管。他就觉得这个是在社会上，你在街上，有一个男人，有一个男人，比如打了一个女人，马上派出所会干预，对吧？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会给予他处分，行政的处罚。对吧？罚款或者拘留，警告，都会。但是为什么发生在家庭当中的暴力就觉得是家务事...家庭私事呢？他就是...他没有建立的妇女也是人，和男人一样，在家庭当中应该有平等地位。男人，男人不可以打女人，女人不应该被男人打，这些观念他没有。他没有这些观念，他还是继承着封建社会的另一种伦理的，这个习俗的...这个状况都是。

所以我们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应该这个，要倡导一种，就是说社会性别的观念，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吧，一定要改变那种，这种传统的，一种观念。如果不改变这个观念，那么，这种状况...妇女的维权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就，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成功就是改变观念。我们三年当中培训了十一期，进行了十一期社会性别的培训。开始的培训很艰难哪。不接受！那些警察还可以。警察因为是文化水平还低一点，你说了他，那么，特别是演练以后，我们用那工作坊，他们改变观念还容易一点。特别是法官，他们觉得他们是有知识的，他们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他觉得社会性别的观念是，是一种错误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培训法官的时候，有一个小组，根本培训进行不下去，法官和我们的协作者对立起来，

顶撞起来，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下去。第一天的培训，就没法进行。我晚上就找这些法官谈话，谈到晚上十一点多。(笑)第二天，勉强强把这个，把这个结束掉。你看那个，就说明那个观念冲撞，很多法官认为这个...这些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她为什么可怜是因为她可恨。这些人是欠揍。女人是撒泼，滚刀肉...好多好多的话。就是只有打顺了，家才...家庭才能过日子，就“打倒女人柔到的面”，这种观念在法官当中，在那个什么当中，那真的是很深很深的。我们对法...对那个什么...对所有的派出所的民警进行了四期，对法官也进行了四期的培训。最后他们真的，他们真的观念都改变了。对医生进行了两期的培训。

有一个法官说的非常好，他总觉得这些妇女都是没事找事，是私人的事，我不愿意管。可是我们告诉他为什么妇女会反复，就因为她那个...就是说社会性别关系的运行图。我们把那个图啊，给他们都讲透，一个一个个案来给他们讲。他们最后就承认了，就是说她们的反复是资源不够，另外她受到的传统观念的，就是说，比如说从一而终啊，离婚没好人哪，好人不离婚哪，什么，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应该为家庭着想，以家庭为本位呀，为孩子着想啊，不能有自己呀，这样一些观念。有些法官在培训以后，他就觉得他过去这种观念都错了。他说，我在一个妇女挨了打以后，离婚，他都要给她，就是判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提出来要撤诉，因为那个男人威胁她，如果你离了婚，你全家我都得同归于尽。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就是说娘家不受到伤害，她没办法，她撤诉了。这个时候，那个法官他说，我劝你不要撤诉，因为这个...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案子下去，你会继续受害的，如果是不离这个婚的话。但是，他听到了这个妇女的这个情况的，他说我理解了，你这撤诉是不得已，现在我们还没有法律能够...就是说保护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你感觉到生命有危险这种情况底下，就是说离了以后能

够保证你们全家的这种安全。那么，这种恶性事故的发生可能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法院没有这个力量.... 他说我对他们多了一份的理解，多了一份的同情。哎呀，讲得特别好。有一个副院长，他第一个是带头跟我们的那个老师顶撞，这个弄不下去的。后来他接着，连着三次参加这个培训，他说我要补这课。后来他就做的非常好。对那些...就是说接待那些妇女，就是说官司打不赢的这些妇女，他们还给她出主意。怎么样来，就是说再起诉，从什么角度来做的能够保证一点。他觉得他自己整个观念都改变了。像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的。过去有些医生对那个什么，那些妇女来的，这个...就觉得你打的也不重，就缝三针嘛，还值得这么哭。过去就这么看，现在就觉得你这个打可能是，是个家庭暴力，然后就把她介绍到我们那个网络来。就是说除了处理伤以外，还要给她很多的帮助。比如说，你是不是，这个，要收好这个验伤的这个报告啊？你是不是应该到，还是应该到派出所去报案哪？这样让她做一个笔录，说，为你这个将来，如果你要证明，这些都是证据呀。对一些需要心理帮助的，介绍到我们天津那个“半边天家园”去。

这些都是社会性别观念改变了他们。而且，现在我们做的好的是，这个观念是新的观念，是社会性别的观念，进入了社会的主流，而且我们要在社区当中，在居委会、这个妇代会，是吧，这些调解委员，这些干部当中，也全部改变他们的观念。这才能够在社区当中形成了一种，就是说，那个民主的平等的这样一种新的观念，才能够，能够站立。我们今年开始已经培训了三期，马上三、四、五月要培训五期。都是居委会的干部，还有推广点的法官，推广点的民警再培训。实际上培训什么，就是社会性别。就是说这些传统的观念不是生来俱有的，不是女人生来是该挨打，是因为社会的观念，对两性和两性的评价、期待和要求都是带有了这种社会的偏见、歧视而来的。他们区分开什么是生理性别，什么是社会

性别。这个社会性别怎么影响我们的观念，影响我们对妇女的看法，他们认识到什么叫妇女为本，那就是说尊重、平等。所以，他们现在接待这些妇女，态度就完全改变了。

他们觉得过去觉得她们是来无事生非，都是...一个一个泼妇，素质太差了，扶不上墙，恨铁不成钢。都是用这种词来形容她们。当一个妇女反复，一会儿说要居委会，一会儿要妇联，做主。一会儿又改变主意了，说我不干了。再挨打又来了，然后呢，她一不挨打，她又变了。他就觉得这些人就是，就是扶不上墙，一堆烂泥。就是这样。那现在改变了，他就能理解她们的处境，尊重她们的选择，而且要懂得，就是说，要促进她们的成长。那个妇联的居委会说，现在明白了，要让妇女们找回她的自我。哎哟，这么个话她都能说了。我们觉得特别的高兴。

张：就是您在天津的那个项目？

王：天津的项目。

张：就说咱们这个组织在其它的...有没有什么分支机构？

王：我们帮助了全国，大概有八、九条，八、九个省市建立了妇女热线。而且全部都是用这个社会性别观念来用这种观念来建立的。是吧，我们帮助了八、九个。

张：那跟我们这个组织的关系是？

王：我们没有，她们说愿意做我们，我们支线，分线，我们没有。我们不图这种名。你愿意叫什么线都可以，你愿意告诉人家说，这是“红枫妇女热线”帮助我的，可以，不说也没关系。我们不在意，我们只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只是做了一个过程，有更多的人关注妇女的健康，给予她们感情的支持。

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你能伸出一个手来拉

他（她）一把，他（她）会很容易就过来了”。这就从我自身啊，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当时真的找不到任何人对我的支持。我找过宗教，比如说，能不能宗教给我支撑，后来实际上是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理想把我拉起来。所以我现在的服务，我觉得也是我的一种理想。在我退休以后...离休以后，我做的这些事情我不图任何东西，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我只是为我自己的一个理想，我希望更多人都能够幸福。在她困难的时候，如果我给她，给她伸出一个手，能够给她一些帮助，这有什么？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也有一种成就感。是吧，我感到很快乐。虽然我每天很忙（笑）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快乐。我们的所有志愿者，都是一句话，说，我们不提倡说我们都是“无私的奉献”，我们不提这个，我们说“助人自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成长，到现在为止，我不断说我也在成长。你看我过去一直就是趴在桌子上写稿子的人，一个文化人，我不会搞管理，现在我还在学。70多岁了，我今年74了，我还在学，怎么样学管理，我现在还是一点一点学。比如说这个尊重别人，和我的工作人员沟通，怎样能够激励大家，（笑）怎么样建立一种管理的机制。这过去我都不会。

张：您现在这个组织有多少工作人员呢？

王：现在才六个人嘛。

张：六个人。那志愿者呢？

王：志愿者我们最多是二百多人，就一共培训过二百多人。现在我们还有七、八十个人哪。对。

张：嗯，那您这个组织的这些工作人员的稳定性？

王：我们就觉得还是不够，过去。因为我们的工资太低了，能够给人的太少了。而我们又要求人家都要有志愿精神。所以你看我，那天我统计了一下，嗯，

十年以上的志愿者还在热线服务的有 6.9(%), 五年以上的有 21%, 应该说真的还是...就是说有一批骨干, 真的棒打不散的。但是因为我们搬了家以后, 离那个地方远了以后, 一下流失了二、三十个人,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张：那您对您这个组织将来的发展有什么设想？

王：有的。当然有设想了。我今天我还告诉她们, 我说你们...我们已经...我已经有一个远景的规划。我说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 应该是关注妇女, 女性的身心健康, 促进女性的全面的发展。我们不仅是解决她一个困难, 给她心理一种缓解, 倾诉的机会, 我们最终要帮助妇女, 自立, 自强, 站起来, 促进她的成长。这才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的宗旨。那么,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新电话心理咨询的权威的机构。在给妇女进行心理咨询方面, 电话的心理咨询上, 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权威的机构。我们应该成为促进妇女心理健康的一个权威的机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还应该成为研究妇女心理的一个权威的机构。我们接到那么多的妇女热线的电话, 我们了解她们的心理, 我们也了解她们...怎样来才能够帮助她们。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这样, 这样一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妇女热线非常有发展前途, 不是妇女热线, 是红枫妇女中心。我只是一个铺路人, 后面应该有人继续走下去。而且应该是这个路越来越宽, 因为社会需要, 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越来越多, 心理压力的人越来越多, 她们越来越需要得到更多的无偿的心理的帮助。而我做这个工作, 虽然我只帮助了, 十二年我们开通才帮助了七、八万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重的是过程, 而不是结果。帮助一人就是帮助了一个人, 十三亿人口来说, 那么我们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但是我们尽力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全部的力量都用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高

兴。但是我们，由于我们的条件太差了，所以很难留得住人。比如说我们不能给那些...就是说更高薪来聘请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专家来当我们的督导。我们不能留住一些更好的优秀的人才，因为我们给人家的工资太少了。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我想总会有一些志愿者，我们既然有 6.9%，十二年...十年以上还在那里留着的，还有 21%的志愿者已经有五年以上。说明我们还是有凝聚力的。我们会在这一批人当中选拔一些愿意有奉献精神的人，而又懂得我们专业的人来把这个工作接下去。所以，我应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张：您这个组织除了这些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把这个组织不断的发展和扩大，当然，还需要一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那么这个资金呢，是怎样来这个...？

王：那都得申请啊。

张：什么样的渠道？

王：国家一分钱也不给。

张：到目前为止，没给过。

王：对，所有的申请...你看我就苦在这儿了。申请资金的工作也是我来做，搞研究的工作也我来做，项目的设计，怎样的来...来去设计项目，这些工作我都要做，我自己还得学习呀。

张：比方说您对资金的申请都是哪些渠道呢？

王：主要的还是国外的基金会。

国内的，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申请到。我甚至提出冠名，谁给我那个钱够我们热线支付一年的，我可以冠名。比如说你什么“飘柔”，什么“大宝”，这样我都可以“大宝妇女热线”这样的话来，我们的经费，在国内。但是这个我们现在还是没打开。可以说工作做的不够

张：另一方面呢，您的这个组织不仅是自己的发展啊，那么跟其它的国内的妇女组织有哪些联系呢？

王：有的，有很多的。比如说陕西妇女那个研究会，她们做的就很好。我们也不断的和她们交流、学习，互相的交流、学习。比如说北大那个妇女法律咨询中心，郭建梅她们那里。

张：援助中心？

王：对，她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有一些个案...

张：转接给她？

王：对，对。转接过去，她们就把它接过来打官司了。有一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她们也没有钱，那她们就...这个法律的诉讼，她们就做起来了。我们现在跟这个反家庭暴力的干预网络，也建立了联系。全国妇联权益部。还有北京市妇联权益部，她们都很支持我们。都说，有什么需要我们...有一些棘手的个案需要我们来干预的，我们都会帮助。我觉得，社会还是给我们支持的。社会还是给予我们很多的支持。

张：您在这个做妇女的这些救助和这个实践社会性别观念的时候啊，那您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大陆女性主义这一方面，特别是社会性别这个观念，它的发展和它的这个实践活动，您还有哪些的这个想法、评价？

王：哎呀，我觉得，真的，“世妇会”对中国的妇女运动，对那个大家更多的接纳，那个...就是说女性视角，这是一个很大的推进。

张：您指的是 1995 年的？

王：对了，对了。这个世妇会在中国的召开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对于接纳...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女性视角是不矛盾的。能够同时兼容了这

个观念的接纳，进入了全国妇联的，呃，领导的这种主流。我觉得真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你还记得...我不知道你参加过没有，在这个世妇会之前，他们还专门来批判。比如李小江的观念啊，什么啊，就觉得好像有些人，就是弄女权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妇女运动啊，都是错误的，要进行批判的，实际上这个批判批不起来。而且后来妇女，这个世妇会以后，黄启璪在公开的场合就提出了，我们应该有妇女的视角。什么叫妇女的视角？实际上就是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真的...这几年，我觉得这是社会性别的观念进入社会的主流，进入了我们中央的决策的主流，已经是在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个婚姻法当中的...修改婚姻法当中能把那个禁止家庭暴力写进这部法律当中，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立法部门，接纳了社会性别观念。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的表现。在那个起草那个婚姻法的修改稿的时候，专家稿，一稿到五稿，还是六稿，都没有把那个禁止家庭暴力的条文写进去。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法是不能写这样的条文，但是最终，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个修改案当中写进去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司法委员会接纳了这个观念。我们的那个妇女纲要，开始是5年，95到2000年，现在是2000年到...2010年的妇女发展纲要当中。实际上这一个发展...这个纲要的公布也是将那种社会性别纳入到政府决策的主流。成立了...国务院成立了妇女与儿童办公室。是吧？这都是...就是说，呃，纳入的社会性别...纳入到这个决策的主流，法律、立法的主流，这个的表现。

当然，我觉得还不够。还需要在方方面面的纳入。特别是司法，已有的法律当中对妇女的保护，比如一些法官，执法人员，这个还没有性别观念。所以，还没有执行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会性别的培训，我们有些，我们在培训基层的时候，有些基层的人员就说，你们培训我们是很对的，但是呢，最终，你

们应该培训高官，高层的领导。我们说，是，我们也争取努力去做这样的工作。

(笑)

张:(笑)看来您这个任重而道远。

王:但是,我们还很乐观的,觉得真的进步很快。

张:但我记得好像,很多人流传过,您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关注女性的话题,研究女性问题的时候,您的个人有的时候处境也很困难。

王:嗯,对,是的。因为这样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在中国是个新生事物。对吧?谁都...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条条块块,它一定要纳入到条条块块当中去,是吧?要有一个政府把你们管起来,那么政府才能够放心。那么,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没有什么靠山的,只是一种热情,一种理想主义的这样一种观念。那么,办了这么一个妇女所。而且呢,还死活就不想让它关门。那么,当然,社会不理解,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有一段的确是很困难很困难。但是,我还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啊,我相信,就是说,呃,最终会...就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会了解,实际上我做的这个工作是对社会有益的。绝对不是,因为很多人脑子里总觉得非政府就是反政府,对吧?他们就觉得,就是...所以对这些民间组织都是有一种不信任,有一种戒心。那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总会让他了解的。最终,我觉得...我很快大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了,而且,最终,这个...就是说包括中央的一些部委,包括一些市委,北京市委一些领导,对于...很明确的表态,就是说你可以大胆的去干,这个,党支持你,政府支持你,你做这些事情是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利的。所以我能够生存下来,实际上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我就说这个过程很自然,我是很幸运的。我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我没有,对我的情绪也没有影响。

(笑)

张：您现在这个组织还是挂靠的吗？

王：没挂靠。

张：单独注册？

王：还是在工商注册。

张：在工商注册。

王：今天我们就到工商去年检了。

张：非营利组织，您怎么在工商注册？

王：哎呀，对呀。

张：那还得要纳税了？

王：不纳税，他们还是，他们工商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主管单位，所以还没办法到民政部注册。我们其实应该在民政部注册。

张：对。

王：但是我们现在注册不了，是因为没有一个主管单位，现在我还在争取。

张：上级单位？

王：唉，争取一个主管单位。

张：那在工商注册不需要上税？

王：不上，我们从来没有交过税。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们很...工商都理解我们。你看，今天我们又到工商去，今年又开年检了嘛。工商说，啊，我们知道你们妇女热线，反家庭暴力。嗯，那态度特别好。他们都知道我们实际上在民政部门无法实行注册，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工商注册。

张：您原来不是有一个挂靠单位吗？

王：后来离开...后来那个什么...就脱钩了。

张：脱钩了，嗯。

王：脱钩，我们就改名了。96年我们就改成“红枫”了。

张：嗯，对。从那时候脱钩的。

王：对，对。

张：就到工商了。

王：对，对。到工商了。实际上就是说民办单位工商注册，我们是第一个。我开创了这条道路，现在好多都在那...都跟过来...都跑工商注册。谢丽华她们也是，跟着我从工商注册。

张：她们是，我知道 NPO 她们也是整天跑那儿注册。

王：对呀，对呀。全都跑工商注册。

张：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王：对，对。这第一个注册就是我。

张：嗯，您这开创了好几个第一个（笑）。女性的 NGO，第一个民间女性的 NGO。当然，妇联也说她们是 NGO。那您看您还对这个课题，对女性主义这个学术研究与实践活动啊，还有哪些话想说的？

王：我觉得，嗯，我们...就是说，实际上是吸取了女性，我们对国外那个，比如说很多流派，他们各自的不同的观点，这些，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关注的重点。我觉得我们吸取的是他们最精髓的东西。比如说，就是说，要实现社会性别的平等。所以，我并不...就是说这个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很多的，这个...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研究。我觉得搞这些可以有一批理论家去做。我是把那个社会性别运用到实际当中去，我把它...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进入社会，进入人们的，改

变人们的观念，进入社会的主流，我主要是做这样的一个推动的工作。所以我对有一些，比如说女性主义的流派，这个...这些很深的理论方面的研讨，这种会议我参加的很少。我也没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比如说，怎样的能够把它的精髓能够改变我们妇女的地位，改变人们的观念，进入到决策，进入到社会主流，这方面的工作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可能跟别人不同。我也不完全是都做这个基层的工作，我还是做了一些社会性别的研究。我这个研究是和我的心理咨询，妇女的心理，是结合起来的。我写了一些论文，这个，也在一些，那个什么上发表了。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用社会性别的观念的。大概就是这样吧。做的不多，就是这样。

张：做的已经非常成功了。

王：也不行。

张：能够生生不息的这么发展到十六年，已经难得可贵了。而且不断在壮大。

王：但是真的需要后来人。这个找一个接班人很难很难。你知道吧，真的很难。太难了。我现在每天就得，还得来上班，盯在那个事无巨细，其实都不应该我做的事情。我应该是把那个研究工作再深入做下去，多写一点东西，发挥我之所长。其实我开始搞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主要是想搞研究。但是实际上我在研究上花的时间太少了。我要做很多的组织工作，找钱的工作，搞项目的工作。这些花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所以，真的，我还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写一点东西。包括我想把我这十六年，这个 NGO 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我也想写出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大家了解到中国的一个草根组织有多么的艰难。其实我跟你说的都是很...就是说很大的，大的概述的...很概括的，是吧？真正的艰难的东西

都还没有谈到。

张：是呀。您这十六年哪。

王：社会的理解。

张：对，十六年的过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不能够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非常期待着您的这个，您的这个著作出来，也是对以后的女性草根组织的一个借鉴。

王：对，对。

张：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课题的支持。

王：哎呀，没关系。你这也是对我的支持呀。是不是？